

再答“钱学森之问”：中国战略人才培养机理探析

郎 帅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80)

摘要:战略人才培养始终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钱学森之问”集中而深刻地暴露了中国战略人才培养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在中国的战略人才培养上,各方需要改变审视“人”的思维,实行系统教育,把受教育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对待;转变对待“人”的观念,实行协同教育,让多方参与到战略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来;变革选择“人”的制度,实行优化教育,让杰出的人才来培养杰出的人才。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大学教育;战略人才;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19)01-0053-04

一、问题的提出

放眼全球,战略人才培养始终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战略人才的供应上长期存在缺口,远未达到供求平衡。正因如此,世界各国都在竞相培养和延揽人才,为本国的安全和发展服务。纵观那些实力强大、经济发达、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国家,基本都是能够培养和吸引大批量优秀人才的国家;而那些实力弱小、经济落后、社会不稳定、人民拮据的国家,也大多是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滞后的国家。从短期来看,战略人才引进有助于解决一个国家的一时之需;但从长期来看,战略人才培养才是一个国家立足世界的根本。

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一定领导角色的全球性大国^[1]。各领域亟须高层次、具有卓越创造力的战略人才。钱学森生前曾反复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钱学森通过引入这一问题表达了他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关心;“钱学森之问”集中而深刻地暴露了中国大学教育以及战略人才培养过程中所存在的缺陷。它激励国人直面现实,着眼未来,沉思求解。围绕“钱学森之问”和高层次战略人才培养问题,政府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社会媒体、机关报刊等一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希望为

我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献良谋、找出路。综合观之,相关对策建议包括了以下视角:重新认知历史文化;变革大学教育;改革学术活动制度;提升学生教师素质;优化管理决策和教育成本;改革高考与录取制度等。

尽管如此,至今这一问题并未获得完美解答。2016年12月7至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高等教育的中心环节是“立德树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就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3]。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4]进一步明确了高校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和最终目标,也再一次唤起了世人对“钱学森之问”的思索。国际战略学认为,教育是国家全局潜力与水准的标志,是国家的战略进尺^[5]。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对于人才培养,尤其是高层次、战略型人才的培养,要予以格外地重视。因为从某些方面来看,中国崛起与中华民族之崛起,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民创造力和领导力的展现。解答“钱学森之问”,关乎中国创新型、领导型战略人才的培养,是中国在大国成长道路上时刻都不能回避的重大战略议题。

收稿日期:2018-10-12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习近平国家利益观研究”(项目编号:18DKSJ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一带一路’语境下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研究”(项目编号:17CX04057B);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研究”(项目编号:YJ20170039)

作者简介:郎 帅(1985—),男,河北沧州人,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外交与大国发展战略研究。

二、“钱学森之问”的实质

“钱学森之问”是在探讨中国的创新型、领导型战略人才培养问题,也即如何造就优质人才。2005 年 7 月 29 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医院探望钱学森,钱学森表示,中国之所以无法完全发展起来,原因就在于“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6]。这是一个大问题。具有两层含义:

首先,中国未来之发展需要人才,特别是创新型、领导型的战略人才,这是“钱学森之问”的第一层含义。国际战略学的核心机理讲求,“基于人而立于国,直面地区而走向世界”。国家的发展为了人,但更需要依赖人,尤其是富于创造精神、具有创新能力和卓越领导力的高精尖人才。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实质是“经济力和科技力的竞争”“而科技竞争的核心则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社会的进步,综合国力的提高,都取决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和高科技人才的培养。人是世间最富有灵性的载体,不仅可以负载、传承知识和技能,而且可以创造知识和提升技能。进入 21 世纪,“知识战”的硝烟早已悄无声息地弥漫于世界舞台,各国对人才的需求更为强烈,竞争亦趋白热化。就我国而言,虽然“战略机遇期”有所延长,但是“转型期”业已到来,同时面临“瓶颈期”和“考验期”。中国要崛起,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新成就要取得,新问题要解决,都离不开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7]。如果没有大批量、一流的高端人才,就从根本上缺乏支撑。

其次,中国现在之大学教育很难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领导型的战略人才,这是“钱学森之问”的第二层含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城市到乡村,从东部到中西部,从南部到北部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学校数量、教师数量、学生数量以及经费投入数量大大增加。可以说,在与“量”相关的多项指标上,中国教育已经获得了巨大突破。但是具体到“质”上,则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素质教育难题”。某种程度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过分关注成绩,唯分数论,很难实现思想道德素质、能力、个性、身心健康诸方面的全面发展。而高等院校作为人才与社会对接的“培养基”和“中转站”,在向各行各

业输送具有创新力、领导力的人才上存在不足。举例说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至今已设立 18 年,截至 2018 年 1 月,总计有 29 位科学家获奖,其中 1951 年前大学毕业的有 20 位。这鲜明地体现了“钱学森之问”所蕴含的战略人才培养困境。

三、“钱学森之问”的症结

40 年前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8]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重要的位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我们是一个大国,在科技创新上要有自己的东西”^[9]。而科技创新上的张力,终归是由创新型人才推涌而出的。目前我国的教育并没有完全摆脱人才培养与输出上的不足,对于高层次、创新型、领导型人才的供应,中国仍存较大缺口。我国战略人才的培养水平,同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解决了“人”的地位问题并未解决“人”的定位问题。邓小平曾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国教育的面貌极大改观,从事教育工作的各类人员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知识分子再次被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获得了广泛的尊重。学校尤其是高校,作为科研与教育的重要阵地重新被重视起来,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可以说,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人”的地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然而,在学者、教师、学生“地位”日益稳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人的“定位”模糊问题却在不断显现,教育战线上的“失位”现象层出不穷。一些管理者、教师、学生“在其位不谋其政”,定位不清,履责不明,无法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方位措置,功能紊乱。这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我国战略人才培养的大环境,增添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负能量”。

其次,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被割裂开来,“人”不成为完人。邓小平曾指出,“抓科学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也即,学校要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必须要从基础做起,任何地方出了问题都可能导致事倍功半,功亏一篑。这就需要教育的每个环节进行精心设计。然而,当下我国教育的现状是:资源分配不合理、机会尚欠公平、阶段性衔接不连贯。横向来看,基础、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巨大,经济发达地区相对于经济欠

发达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地区相对于农村地区，优势十分明显，人才流通存在“过程性障碍”。纵向来看，一些小学教育基础不牢，学生在过重的负担中逐渐失去了学习的兴趣；一些中学教育忙碌无为，学生在追求分数的重压下进一步禁锢思维；一些高等教育过于松散，学生从常态性的紧张中突然进入“放松”的环境，无法建立独立坚强之人格。在这种形势下，虽然存在各类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但是很多学生的成长过程被割裂开来，杰出人才的“有机生成机制”遭到破坏，即便有些学生在某个阶段获得了优质教育，却很难保证全程的系统性。

再次，我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缺陷，“人”很难做到才尽其用。邓小平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现在有些人的成就外国人都公认，我们反而不了解，这说明我们的一些制度有缺陷，不能发现人才，要认真改进。”^[10]认真分析古今中外创新型人才和领军人物的成长经历，不难发现，他们大多得到过大家的指导、名师的培育。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杰出的人才来推动，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基本都是如此。目前，中国的情形可能更为复杂，即一方面要选拔“真才”，另一方面要规避“假才”。有研究表明，科学技术也具有“负面效应”，是一把“双刃剑”，人才的选择不当可能会加剧这种负面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

四、“钱学森之问”的解答

战略人才培养关乎国家未来、民族兴衰和人民幸福。它不是一项单纯的教育议题、社会议题或经济议题，而是一项战略议题，必须要从国家层面、战略层面予以高度重视。中国正在努力成长为一个创新型国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习近平主席指出，“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人才就是未来。”^[11]人的问题终归要回到人身上，解答“钱学森之问”要围绕着“人”下功夫，这包括：

第一，改变审视“人”的思维，实行系统教育，把受教育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对待。人之所以成为人，有其自然成长规律。教育是个典型的系统工程，从输入的角度来看，战略人才培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要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全面抓起。所有这些阶段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某一阶段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到最终的输出结果——即杰出人才的育成。实际上，钱学森的问题只是涉及了战略人才培养的下

游，也就是大学阶段。但是，人才培养不可能脱离小学阶段和中学阶段的积累，少了“上游”基础教育和“中游”中学教育的强力支撑，高等教育的成效就会大打折扣。以钱教授自身的成长为例，他的求学经历囊括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海交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等国内外名校，前后延续、跨越东西，在纵向和横向上搭建起了一个坚挺的骨架，丰实饱满，从而塑造出了一个科学巨人。这启示我们，战略人才培养要注重系统性，对教育过程中的每个部分都要重视，务必精而强。毕竟，杰出人才的育成不是短期之事，要从小到大，从初级到高级，精雕细琢。

第二，转变对待“人”的观念，实行协同教育，让多方参与到战略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来。高层次、创新型、领导型人才的培养很少是单方面作用的结果。2014年5月22日亚信上海峰会后，习近平主席召开了外国专家座谈会，他强调不论何时，“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为此，中国的对外开放要“着眼于人、着力于人”，推动人们在眼界上、思想上、知识上、技术上走向开放，“通过学习和应用世界先进知识和技术，进而不断把整个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这从一个侧面启示我们，对于战略人才培养要秉持一种开放的观念，要多学科协同、多方参与其中。毕竟，只专注于一个学科，很可能会禁锢人的思维；忽视多方的教育，很难培养人健全的心智；侧重直接方式，并不能直接培养出杰出人才。因此在学科上，应坚持理工文兼收并蓄，培养协调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在参与方上，家庭、学校、社会、政府要实现合力共振，促进教育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时代，还要注重与国际接轨，借助和引进外部资源育中华之英才。

第三，变革选择“人”的制度，实行优化教育，让杰出的人才来培养杰出的人才。邓小平曾经说过，“只有老师教得好，学生才能学得好”。习近平主席指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不仅要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也要完善人才选拔机制。因为，只有能够发现更多“真才”，才能够找到更多培养“真才”的人，形成良性循环，这样战略人才的培养才会有希望。笔者认为，当下中国高等教育中，一流的老师不但拥有真才实学，而且以烘托出学生的“意志自由”为天职。这些老师虽为师长，但始终抱以求学之心，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实现突破。他们变传统“自上而下”的师生

关系为“自下而上”的师生关系,也即老师由“俯视”学生变为“仰视”学生,以能够培养出超越自身的巨人为最高人格鉴赏。中国要持续改进自身的人才选拔机制、使用机制和评价机制,为一流的“真才”提供机遇,从而推涌出更多的战略人才。

五、结论

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新兴大国,并承担起了更多领导世界的角色。改革开放的深入、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推行,表明了中国继续发展、更好发展、引领发展的决心;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组建、亚投行的成立、

“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实施,彰显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愿、对世界的原创性贡献。这都需要大批高层次、创新型和领导型人才的支撑。“钱学森之问”集中反映了中国教育和战略人才培养上的问题,目的是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求人才。着眼当下,中国的教育要面向人,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同时,兼顾“后人”的未来,勇于保持操守,打破常规,为杰出人才的成长奠基铺路。本着为了人、重视人、造就人的思路,我国战略人才的培养要坚持系统原理、优化原理和协同原理。

参考文献:

- [1] 郎帅.国际关系中的“位置”变化与中国的领导角色[J].领导科学,2016(10):8.
- [2] 杨春艳,李沛武.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促进创新人才培养: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信息与控制学院为例[J].创新科技,2016(6):51.
- [3] 吴晶,胡浩.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J].中国高等教育,2016(24):5.
-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6.
- [5] 王家福.国际战略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57.
- [6] 黄伟.人才培养视角下民国大师级人才成长规律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1):37.
- [7] 郎帅.从梦想到现实:中国梦三重思[J].理论月刊,2015(8):28.
- [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0.
- [9] 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6-06-01(2).
- [10] 石柏年,励永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思考:论邓小平人才思想的时代特色[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6):40.
- [11] 霍小光,吴晶晶.坚定不移创新创新再创新 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N].人民日报,2014-06-10(1).

The Answer to “The Asking of Qian Xuesen”: An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China’s Strategic Talent Training

LANG Shuai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Strategic talent training has always been a global problem. “The Asking of Qian Xuesen” intensively and profoundly exposes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education and its training of strategic talents. In terms of cultivating strategic talents in China, all parties need to convert their thinking of treating “human beings” by carrying out systematic education and treating educated people as a complete “person”, to change the values of treating “human beings” by implementing coordinated education so that various partie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training of strategic talents, and to update the system of choosing “people” by carrying out optimal education and employing outstanding talents to cultivate outstanding talents.

Keywords: “The Asking of Qian Xuesen”; college education; strategic talent; talent training

[责任编辑 李潜生]